

马克思“主体自我意识”观从批判到建构 ——基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陈雨柔, 马玉欢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4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16日

摘要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思辨哲学转向现实批判的标志性文本。马克思以宗教批判为切入点, 以“现实性”为核心立场, 批判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青年黑格尔派所代表的非现实“主体自我意识”观。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建构起以“群众”范畴为载体, 以“理论批判与人的高度的革命的辩证统一”为路径, 以“人的解放”为指向, 突破了德国传统抽象阐释局限的“主体自我意识”观。尽管受到马克思早期思想语境的制约, 该观念仍带有人本主义痕迹, 但其“主体自我意识”观的现实化建构, 对后续马克思主体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马克思, 主体自我意识, 现实性, 人的解放

Marx's Conception of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From Critique to Construction

—A Study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Yurou Chen, Yuhuan Ma

School of Marxism,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rch 14, 2026; accepted: April 4, 2026; published: April 16, 2026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serves as a landmark

text marking Marx's transition from speculative philosophy to the critique of reality. Taking the critique of religion as his point of departure and "reality" as his core standpoint, Marx critiques the unreal conception of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represented by Hegel, Feuerbach, and the Young Hegelians. On this basis, Marx constructs a conception of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that takes the category of "the masses" as its carrier,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oretical critique and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heights" as its path, and "human emancipation" as its orientation, thereby transcending the limitations of the abstract interpretations of German tradition. Although constrained by the context of Marx's early thought and retaining traces of humanism, the actualized construction of his conception of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exerte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on the subject.

Keywords

Marx, Subjective Self-Consciousness, Reality, Human Emancip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认,是近代哲学探索的核心命题。康德以“哥白尼式的革命”打破传统认识论中“主体符合客体”的被动认知状态,提出“人为自然立法”论断。康德以后,黑格尔将“主体自我意识”推向思辨哲学的高峰,“绝对精神”成为主体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终极形态。“主体自我意识”在黑格尔那里走到了极点,但它并没有终结。德国古典哲学在主体理论的建构上实现了思辨层面的完满,却又陷入抽象化的困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应运而生。《导言》作为马克思从思辨哲学转向现实批判的标志性文本,已蕴含“主体自我意识”观从批判到建构的完整逻辑。

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体思想研究已趋成熟。国内早期研究以高清海、俞吾金等为代表,通过文本考据厘清了马克思主体理论演进脉络,强调主体性的结构变革。近年来,学界研究逐渐细化,开始关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政治哲学意蕴,但多侧重于“人的解放”等宏观结论,弱化了“主体自我意识”重塑的本体论逻辑;国外学者如哈贝马斯、霍耐特等试图以主体间性理论重构马克思的主体观,虽拓展了哲学研究的视野,却易于在理论重构中消解其现实性。

总体而言,既有研究少有聚焦“主体自我意识”概念,系统阐释马克思在《导言》中对非现实主体的清算,及其现实主体的建构逻辑。基于此,本文将“现实性”为核心,剖析马克思是如何通过批判黑格尔等人,确立起以“群众”为载体的现实“主体自我意识”观。

2. 对三种非现实“主体自我意识”观的批判(直接批判与间接批判)

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开始,对黑格尔国家理性意识、费尔巴哈感性人本意识与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精神意识,这三种非现实“主体自我意识”观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主体自我意识”观建构的逻辑起点。

2.1. 黑格尔国家理性意识导致“主客体颠倒”

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关于宇宙本身的“终极实在”,“国家理性意识”则是“绝对精神”在伦理阶段的现实化。“国家理性意识”不是现实国家的经验属性,而是国家的“理念”或“本质”,它将自己

视为理性的集合体。黑格尔将“能自我意识、自我实现的精神性存在”定义为真正的主体,国家作为“绝对精神”的现实形态,就拥有了主体的属性,凡是依赖于这种主体,服务于主体自我实现的,都是客体。这一界定从根源上确立起国家理性为主,现实存在为客的关系,“主观意志拥有真实性和实在性本质上只是在它在其本身中是作为理性意志的定在的时候。”[1]在这个前提下,国家理性意识对“市民社会”就具有了逻辑上的优先性和现实上的统摄性。市民社会不再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载体”,而是国家理性用以实现自身的工具,人的主体性也被国家理性的普遍性所消融,国家理性意识成为了具有自主目的的“主体”,人降格为服务于国家理性意识的“客体”。

马克思在《导言》中,既以宗教异化作为突破口,确立“人就是人的世界”的现实立场,又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出发,进一步完成对主客体颠倒困境的清算。

马克思在《导言》开篇,便指出“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2], p. 1)。人出于对苦难尘世的不满与自身的无力,将脱离痛苦获得幸福的愿望寄托于一个虚构的“他者”,是人创造了“神”,但这个“神”却被抬高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人反过来成为了“神”的附属品。人需要通过供奉“神”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人的本质被自己创造的产物所支配。通过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得出结论:当人的本质外化后,其外化的产物脱离人的控制,就会反过来成为支配人的力量。黑格尔的“国家理性意识”,正是这种颠倒逻辑在哲学和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成为了先于人的存在、支配人的终极力量。

马克思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批判“主客体颠倒”。马克思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3]。国家是市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人则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前提。人在市民社会中从事具体的物质生产,开展实现其私人利益的活动。市民社会由不同阶级的复杂人群构成,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保障物质生产秩序等种种需求,国家应运而生。人在市民社会中的实践活动促使了“主体自我意识”的生成,人们通过劳动、交换、利益互动,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利益诉求、阶级属性,形成一种意识自觉,“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又以自己的意识和意志支配对象进行对象性活动实现自身”[4]。人意识到自我存在,意识到市民社会的生活之后,才能意识到国家。黑格尔的国家理性意识则颠倒了这一意识生成顺序,它无视人的主体地位、无视市民社会中真实的利益冲突,要求个体服从于抽象的国家秩序,失去了现实的内容,沦为“非现实的意识形态”。

2.2. 费尔巴哈感性人本意识忽视社会属性

费尔巴哈拒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拒绝费希特“理智直观”的先验性,费尔巴哈将“感性”视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赋予感性以真和现实的意义。“感性人本意识”则是一种以“感性”为基础的“人本位”意识,它主张从“感性的、有血有肉的人”出发去理解世界,感受自身,费尔巴哈认为,人是一种“感性存在物”,人的意志不仅指向生存,也与追求幸福的愿望紧密相连。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的“人”是抽象的超社会、超历史的“类存在物”,“人”是没有阶级、没有职业、没有具体社会地位,是仿佛存在于“真空”中的人。

马克思在《导言》中,先是肯定了费尔巴哈的核心贡献。费尔巴哈以感性人本意识为基础,颠覆了“神创造人”的宗教神话,确立起“人创造宗教”的唯物主义立场,这是他的重大突破,也是马克思批判的起点。

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感性人本意识虽以“反异化”为核心目标,但却仅仅局限于“宗教异化”。费尔巴哈从宗教的自我异化出发,将宗教世界归于世俗基础,但他并没有彻底地否定宗教。费尔巴哈要求把“神”还原为人,主张废除宗教对于人的精神控制,用爱这个概念取代对神的信仰,“必须拿对人的爱当作唯一的宗教,来代替对神的爱,”[5]让人回归到“感性本质”之中。费尔巴哈没有看到现实社会中

的异化、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工具对人的奴役。这种“反异化”实质上是用精神批判取代社会批判,使得感性人本意识沦为“消极的直观理论”。它无法提供改变人的异化状态的解决方案,因为它不承认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的载体,也就不会主张通过改造社会关系来实现人的解放。

马克思强调要“向德国的制度开火”,要批判现实社会。在《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2], p. 1)。宗教批判是前提,但必须指出仅批判宗教是不够的,宗教造成苦难,并非是因为宗教本身,德国的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2], p. 5)。1843到1844年的普鲁士是披着“立宪外衣”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贵族与宗教势力相互勾结,普通群众成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费尔巴哈打着“爱”的旗号,不过是将群众从旧宗教下接引到“新的宗教”中,这不过是路德新教的复现。

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主体是“社会关系中的实践的人”,人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劳动、交换、阶级互动等实践中,被具体社会关系所塑造的现实存在;“主体自我意识”也不是对感性本质的直观,而是对自身社会地位、实践境遇的自觉。

2.3. 青年黑格尔派抽象精神意识脱离群众实践

青年黑格尔派内部成员之间的学说略有不同,但是他们的共同点都表现为激进的人道主义无神论主张。青年黑格尔派早期以宗教批判为核心,施特劳斯的《耶稣传》针对福音故事展开颠覆性的神学批判,他摒弃了福音故事的“神圣性”叙事,将其解读为“整个民族或宗教团体的共同意见的产物”[6],认为福音故事本质上是人的精神产物被异化后的“神圣幻象”。鲍威尔则更为彻底地推进了宗教批判,相较于施特劳斯的“集体故事”,鲍威尔主张福音故事是个别宗教思想家的主观虚构,目的在于建构“神圣权威”以维系宗教统治。

虽然青年黑格尔派进行的宗教批判,以激进的姿态撕开了基督教神学的神圣面纱,破坏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宗教与理性的调和框架,在思想启蒙层面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仅停留在精神与意识领域的批判,将“精神”“自我意识”作为终极的批判工具与历史动力,认为仅凭思想的启蒙与意识的觉醒就能实现人的解放。

马克思在《导言》中虽然没有直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但其批判逻辑已暗含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脱离群众实践的抽象性倾向的否定。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精神批判,实际上是将“自我意识的觉醒”局限于少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也是仅停留在“思辨对话”中,这是对“主体”的窄化,也是对“自我意识”的抽象化,“自我意识如果以纯粹概念来确证自身,那么自我意识将没有现实根基”[7]。马克思强调“精神批判”无法代替“实践批判”,“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 p. 9)。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批判再激进,也只是“批判的武器”,尽管思想、精神层面的批判能够起到“解释世界”的作用,让人意识到异化存在,但它无法成为消灭异化的根本性力量,它也无法成为改变现实压迫的物质力量,真正的问题始终在于如何“改变世界”。

青年黑格尔派所主张的抽象解放目标,则背离了群众的现实利益诉求。青年黑格尔派虽批判宗教,但丝毫不关心群众的现实处境,甚至指责群众“精神蒙昧”,未批判造成苦难的封建制度与资本剥削,也未提出改善群众现实境遇的方案。他们所追求的“自我意识觉醒”,对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农民与工人而言,是脱离现实的空谈。

3. 以“现实性”为核心的“主体自我意识”观的建构

对三种非现实的“主体自我意识”观的批判,为马克思的理论建构扫清了障碍,“现实性”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体自我意识观”确立的核心原则。马克思的“主体自我意识”观就是在彻底的理论批判与“人

的高度的革命”的辩证统一过程中, 形成对自身被压迫处境的觉醒、对自己作为历史主体的认同以及对人的解放使命的实践自觉。

3.1. 以“群众”这一范畴为建构载体

在《导言》中, 马克思将“群众”视为处于封建专制与宗教异化的现实处境中、承受着压迫与苦难, 有着强烈现实解放诉求的大多数人。这个大多数人的核心是无产阶级, 是国家、社会、世界的直接承载者。“群众”既是唯一能突破“抽象性困境”的现实载体, 也是马克思“主体自我意识”观建构的前提。

马克思的“群众”是最需要、也最具有解放动力的主体。马克思在《导言》中阐明了德国解放的可能性,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 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 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 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 ([2], p. 15)。群众在苦难的尘世中承受着最为直接的剥削与压迫, 他们对解放有着最为迫切的现实需求。群众的苦难是可以被感知的现实困境, 农民在土地兼并、苛捐杂税的乱状中难以生存; 工人则沦为机器里“会说话的螺丝钉”。群众的苦难源于现实, 群众需要获得的解放不是“精神上的自给自足”, 而是以行动给予现实强大的冲击, 迫使其改变。

马克思的“群众”是最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实践性的主体。群众是社会生产劳动的直接参与者, 也是阶级斗争最具革命性的践行者。群众的衣食住行、做工种地等活动, 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物质现实。群众不是孤立的个体, 而是处在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群体。“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 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 ([2], p. 15)。群众在同一社会关系中, 共享相似的存在体验, 形成天然的社会联结。群众不仅能够“生产财富”, 更能产生巨大的历史发展推动力, 他们是改造社会的“行动者”。从19世纪初砸毁机器反抗剥削的“卢德运动”, 到1831年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 工人群众通过持续的阶级斗争, 迫使现实制度进行改变。“群众”不是抽象的哲学范畴, 而是有现实痛苦的实践主体。

以“群众”为载体的“主体自我意识”不再是“停留在头脑中的观念”, 而是能够通过群众的实践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 “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2], p. 9)

3.2. 以“理论批判与人的高度的革命的辩证统一”为建构方式

理论与革命是马克思哲学中无法拆分的共生体, 马克思的理论不是“悬浮的真理”, 它在革命实践中生成、检验并逐渐完善, “理论批判与人的高度的革命的辩证统一”, 二者既不是“先理论后革命”的线性先后关系, 也不是“理论指导革命”的单向支配关系, 理论批判因革命实践而获得生命力, 革命实践因理论批判而获得历史自觉。

理论批判是革命的“头脑”, 它为群众提供认知觉醒的前提。马克思的理论批判抓住“群众的现实处境”这个根本, 揭露宗教虚幻的幸福、国家理性的抽象支配、精英批判的“空洞词句”, 不仅让群众意识到“我在受压迫”, 还要让群众意识到“我要反抗压迫”, “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 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 应当公开耻辱, 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 ([2], p. 5)造成群众苦难现状的不是神的惩罚, 也不是精神或物质的贫瘠, 而是残酷现实制度奴役的结果, 群众要对这种苦难加以拒斥, 意识到“我要解放”。

革命是理论批判的“心脏”, 它为群众提供“实现的契机”。革命不是精神的自我推演, 而是群众的集体实践斗争, 是理论批判的现实化。理论的批判必须要通过“武器的批判”才能够落地, 当群众在反抗压迫、推翻奴役统治的革命实践中, 切身体认到自身的历史主体性力量, 便完成了从“认知到自己是主体”到“在实践中确证自身为主体”的质的飞跃。一方面, 这种主体自觉会驱动群众以更积极主动的

姿态投身于革命斗争, 充分发挥自身的实践创造力; 另一方面, 革命实践推进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到更深层次、更复杂的现实难题, 这又会反向倒逼理论批判实现自我扬弃与深化发展, 从而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并发展理论”的辩证运动, 最终为推翻一切奴役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筑牢根基。

3.3. 以“人的解放”为“主体自我意识”的建构指向

在《导言》中马克思所谈论的“人的解放”不是“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而是最彻底的革命、最普遍的人的解放。马克思要消解的是深层次“人对人”的剥削与压迫关系, 要确立的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即人作为自由自觉的实践主体, 在劳动中确证自身的本质力量, 在社会关系中实现人与人的真正平等, 让人回到根本、人成为人, 最终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人的解放”是“群众”解放的内在要求。群众作为“主体自我意识”的载体, 是承受现实压迫、有现实解放需求的“大多数人”, 这一载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主体自我意识”观的建构必须以“人的解放”为根本指向。若“主体自我意识”的建构偏离“人的解放”这一现实目标, 就会丧失与群众现实生存境遇的关联性, 既无法获得群众的价值认同, 也无法与自身的物质载体形成同构关系, 最终只能沦为脱离现实的思辨理论。群众的“主体自我意识”, 从生成的起点就指向了“现实幸福”, 获得解放, 才能获得这种幸福。因此, 只有以“人的解放”为指向, 才能唤醒群众, 让主体意识成为“群众自己的意识”。

“人的解放”是“理论批判与人的高度的革命的辩证统一”的标尺。马克思在《导言》中指出: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 同样, 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 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2], p. 16)。“思想的闪电”就是哲学的理论批判, “素朴的人民园地”则是尚未觉醒的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 当理论批判彻底贯注于革命实践, 才能打破人的“异化”状态, 实现“解放成为人”的终极目标。判断一种理论批判是否具有“高度”, 在于它是否以“人的解放”为终极旨归, 是否能够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否能够转化为无产阶级的自觉意识。判断一场革命是否具有“高度”, 在于它是否能够成为现实的解放力量, 是否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向更高级的形态迈进。理论批判与革命实践的辩证统一, 不是一个静态的理论命题, 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 这一过程的合理性必须由“人的解放”的现实成果来确证。

4. 《导言》中马克思“主体自我意识”观的理论辩护

《导言》作为马克思哲学革命范式的起点, 它既是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立场、完成哲学立场根本转变的标志性文本, 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萌芽的重要开端。《导言》兼具“革命性”与“不成熟性”的矛盾统一, 这种矛盾的表现使其在概念表述、理论逻辑与价值指向上都面临着被误读、被低估的危险。必须对其进行系统的理论辩护。

4.1. 带有人本主义抽象色彩的特征

在《导言》中, 马克思对“主体自我意识”的建构并非是彻底的无前提创作, 而是呈现出一种新旧思想交织的复杂图景。马克思早期深受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 在 1843 年的《导言》中, 马克思延续了费尔巴哈将宗教批判锚定于人本主义视域的批判路径。

这一时期, 马克思对于主体、主体意识的生成、解放的理解, 还未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物质生产实践”基础上, 仍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特征: 第一, 对主体载体定义仍然具有抽象性。此时的马克思尚未意识到“生产关系”的重要性, 是从“人的本质被异化”的角度出发, 将群众定义为“被彻底剥夺了人的本质的群体”, 没有从具体的、特定生产关系去进行分析, 也没有将无产阶级视作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直接对立的雇佣劳动者阶级；第二，对革命的理解仍然带有“思想决定革命”的抽象色彩。马克思的革命还没有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更倾向于一种由群众的意识觉醒而引发的暴力武装斗争，没有将革命与物质生产实践的变革建立直接联系；第三，对“人的解放”目标带有“人的本质复归”的人本主义抽象指向。马克思此时仍然是将解放的核心诉求界定为对“被异化的人的本质”的复归，追求的是人的类本质的完整性与主体性的重塑。“人的解放”未落实到具体的社会关系变革，也并未阐明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如何。

然而，这种人本主义的特征并非是本质的理论错误，而是一场充满张力的理论冲突。一方面，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感性人本主义影响，将无产阶级的苦难视为“人的本质”的丧失，这种伦理上的激愤构成了革命主体的情感动力；另一方面，他又敏锐地触及到了“私有制”和“社会关系”对主体的塑造作用。在这场理论碰撞中，马克思对于“解放”的理解，既是人本主义层面的“复归”，又是现实层面的“革命实践”。前者提供了价值批判的武器，后者提供了变革现实的路径，二者在文本中既相互支撑又相互消解。

4.2. 奠定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思想的发展脉络

《导言》的关键贡献不在于理论的完备性，而在于它跳出了黑格尔“精神主体”和费尔巴哈“抽象个体”的桎梏，为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思想开辟了全新方向，并确立起三个核心理论支点，为后续马克思关于人的主体思想发展奠定基础。

马克思确立了“主体载体现实化”原则。不同于黑格尔将“绝对精神”作为历史主体的唯心主义观念，也不同于费尔巴哈对“抽象人”的直观理解，《导言》强调主体是“普遍的受压迫的群众”，主体的觉醒与行动既植根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物质生产条件，又同自身的生存境遇和解放诉求紧密关联。《共产党宣言》中直接继承了“主体载体现实化”原则，并进一步将主体具象为“现代无产阶级”，明确主体的阶级属性、历史地位与实践路径。

马克思确立了“理论与革命辩证统一”的主体思想生成机制。马克思突破了传统哲学将主体意识生成归结为“精神自我反思”的唯心主义局限，认为“主体自我意识”是在理论批判与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中生成。“理论批判”唤醒群众的“主体自我意识”；革命实践则是“主体意识外化”的物质力量。后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的“革命的实践”原则，正是对这一生成机制的哲学升华，强调“人改造环境”与“环境改造人”的双向过程，即革命实践既是改变现实社会关系的手段，也是人实现自我觉醒、确证主体地位的途径。

马克思确立了“人的现实解放”是主体解放的锚点。《导言》中明确地指出，解放的核心不是精神的虚幻觉醒，而是对现实奴役关系的彻底破除。主体的觉醒与行动是为了实现彻底的自我解放，而“解放一切人”又是解放自我的必然前提。“人的现实解放”的价值导向贯穿马克思后续理论创作，无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还是《资本论》对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剖析，始终围绕“人的现实解放”这一核心展开，逐步深化了主体解放的现实路径与科学依据。

总而言之，《导言》绝不是孤立的早期文本，而是马克思的奠基性文本，它为后续理论发展提供了“逻辑土壤”。

5. 小结

《导言》不是马克思“为批判而批判”的著作，马克思对三种非现实的“主体自我意识”观的批判也不是“单纯否定”，批判的过程也是建构的过程，二者是同一逻辑的两个方面。马克思正是通过揭露前人理论的缺陷，明确了自身理论的“现实性边界”。同时，我们还需注意《导言》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转

型的标志性文本,兼具进步性与局限性的特点。此时,马克思“主体自我意识”观的建构仅是初具雏形,并未形成闭环的逻辑体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但不能因此否定《导言》的重要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识,我们切不可掉入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理论的陷阱之中,不能割裂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导言》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初步指认、对理论批判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最初探索,已经孕育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项目基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项目(XJ2023GY06);“天山英才”培养计划——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和新疆文化名家项目(2023QNYC026)。

参考文献

- [1] 黑格尔. 精神哲学[M]. 杨祖陶,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282.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13.
- [4] 贾云飞. “人 = 自我意识”与马克思对象性活动的建构[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11): 44-53.
- [5]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 荣震华, 王太庆, 刘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786.
- [6] 斯特劳斯. 耶稣传[M]. 吴永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215.
- [7] 汪洋.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自我意识”概念及其理性主体维度[J]. 哲学评论, 2023(1): 309-323.